

从群体对立视角分析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失序问题

张炳卉

新疆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中国与中亚作为睦邻友好的战略伙伴,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合作涉及多个领域。2024年12月27日, 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 标志着中国—中亚合作再次走深走实。在“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与中亚密切发展的关键时刻, 进一步了解处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及其政治失序问题, 有助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将中吉乌铁路项目落到实处, 进一步密切中吉双方关系。作为吉国社会一大矛盾的部族主义是吉国陷入政治失序的重要困境, 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决对策, 对中国的民族工作以及新疆地区的发展,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 群体对立; 政治失序

一、政治失序概述

(一) 政治秩序与政治失序^[1]

政治秩序是一个政治系统或社会中, 各种政治行为人在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规定的空间和规则中采取行动来获取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所有行动造成的结果。当这种行动带来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具有稳定的趋势或模式的, 则该社会或政治系统就获得了政治秩序。而当这个社会或者政治系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处于崩溃或临近崩溃的状态时, 就被称为政治失序。

(二) 政治失序的测量指标^[1]

“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 自2005年起由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和美国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共同编制, 该指数其实测量的是政治失序的程度, 即全球所有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是否处于崩溃或临近崩溃的状态。这一体系最早包括12个综合指标, 涵盖社会、经济、政治三个领域。

其中, 社会领域中的“群体对立”指标, 主要测量一国内部不同群体(族群、阶级、教派、地域)之间存在矛盾或暴力冲突情况。

通过对一国“群体对立”现象的研究, 可以更好地透析该国政治失序的原因, 并提出相关对策、总结经验教训。

(三)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失序现状

作为中亚政治生态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目前处于政治失序状态,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政局不稳定。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 历经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革命、政权两次非正常更迭、政体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反复横跳、先后多次更改宪法、执政联盟解散等一系列的变故, 造成社会动荡, 经济下滑。此外,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腐败问题严重, 根据国际透明组

织发布的2022年清廉指数排行榜, 吉尔吉斯斯坦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7位。

第二, 社会治安环境差。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治安状况不佳, 当地居民可合法持有枪支, 针对中国在吉商人的敲诈与抢劫案件仍时有发生。

第三, 经济下行压力大。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统计, 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下滑严重, 2021年有所增长, 但增速放缓; 与2020年相比, 吉尔吉斯斯坦2021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11.9%; 2021年, 吉尔吉斯斯坦通货膨胀率超过10%; 2022年3月24日,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吉尔吉斯斯坦主权信用评级为B3, 并列为负面观察名单。

二、群体对立概述

(一) 群体对立的内涵

群体(group)指的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合到一起并形成互动和相互依赖关系的两个或更多个体。^[2]由此可以给“群体对立”下一个定义: 群体对立是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而组成的集合体之间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现象。

(二) 吉尔吉斯斯坦群体的对立现状

吉尔吉斯斯坦的群体对立突出表现为部族主义。吉尔吉斯学者M·安瓦尔别克认为西方学者的“部族”概念用吉尔吉斯语可以有两种表达形式, 即“兀鲁克(УЛУК)”和“兀鲁(УЛУУ)”。其中“兀鲁克”主要指依靠现实血缘纽带联系的小部族; 而“兀鲁”则指密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其成员之间不仅有现实、而且有臆想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共同体。M·安瓦尔别克根据其“兀鲁”的阐释把部族传统称作部族主义。在他看来作为部族主义的部族传统反映在其成员在解决共同的社会和

政治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团结精神。^[4]

根据M·安瓦尔别克的阐释,可以给“部族”和“部族主义”下一个定义:即部族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具有现实或臆想的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而部族主义是一个部族内的成员共同维护本部族的利益,甚至不惜侵犯、危害他人利益的一种思想。

而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天山为界,地分南北,形成了两方势力——南方部族和北方部族。两方部族为了谋取各自更大的利益,彼此之间摩擦不断。吉国独立以来,两方部族之间矛盾重重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政权更迭的频繁,总统职位也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三、吉尔吉斯斯坦群体对立对政治失序的作用路径分析

吉尔吉斯斯坦陷入政治失序的泥沼,群体对立是一项重要原因。

(一)部族主义导致吉国政权更迭频繁、政策难以延续
考虑到不同部族的利益,吉国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同一任期中,总统为北方部族,那么总理就为南方部族;不同任期中,总统由南北方部族轮流担任。

吉国两任总统阿坦巴耶夫和热恩别科夫,前者出身于北部的楚河州,后者出身于南部的卡拉库勒贾地区,分属南北两大部族。2019年,热恩别科夫对前任总统阿坦巴耶夫进行“清算”,以“涉嫌腐败、非法夺权、非法改造土地”等罪名派兵逮捕了阿坦巴耶夫。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前来保卫,在双方的激战中,有一名士兵死亡。这场闹剧最终以阿坦巴耶夫的投降为结局。这场闹剧看似结束,其实并未结束;这场闹剧看似是个人矛盾,实则是南北两大部族之间的博弈。两任总统的“个人矛盾”上升为国家矛盾,热恩别科夫否定了阿坦巴耶夫执政期间的诸多政策,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社会更是雪上加霜。

阿坦巴耶夫和热恩别科夫之前的矛盾并非个例。虽然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只有三十多年,但几乎每一次的权力更迭都会伴随着一次“大清洗”。原有的政策措施维护北方部族的利益,那么下一任总统大多会改变原有政策,为南方部族谋取更大利益。

民主政治的外衣下,是部族政治的内核,而政权也不过是两大部族博弈中的牺牲品。这种环境下,国家的政策自然难以延续,这也使得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很难整合全国力量去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因此吉国长期处于社会动荡、经济难以发展的窘态,久而久之就陷入政治失序的困境中。

(二)部族主义导致吉国裙带关系盛行、腐败问题严重^[7]

部族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具有现实或臆想的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因此,部族成员之间本身就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这一联系主要是血缘关系。

出于维护本部族利益的需要,吉国中央的重要官员,大多与总统出身于同一部族,且大多都有裙带关系。吉国第二任总统巴基耶夫在任期间,许多中央官员都与他沾亲带故:小儿子马克西姆是国家财产基金会主席,大儿子马拉特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哥哥扎内士是国家警卫队总司令,弟弟阿克马特是贾拉拉巴德州州长。依靠裙带关系组建的政府,自然无法避免以公充私,拿国库充实自己的腰包。因此,2006年,吉国GDP只有28亿美元;2007年,吉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00%。

此外,吉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期间,卖官鬻爵现象严重,数百万美金就可以买到一个部长级的职位,而选票更是明码标价,一张只需要15美元,每年捐官的收入,占到了GDP的20%左右。这些钱最终都进了北方部族特别是阿卡耶夫家族的腰包。为部族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是吉国腐败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

总统借助部族产生,维护部族利益,而更好地维护部族利益就要求有更多出身于本部族的官员掌控重要部门。上文提到,部族成员之间的联系主要是血缘关系,因此,部族政治中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与裙带关系挂钩。无论是直接的裙带关系还是间接的卖官鬻爵,都是吉国陷入政治失序困境的幕后推手。

(三)部族主义导致吉国地区矛盾加重、威胁国家统一

上文提到,吉国的两大部族主要以天山为界,显然,两大部族的矛盾从地域上来讲就是南方与北方的矛盾。南方部族要求南方的利益,北方部族要求北方的利益,而两大部族之间又有天山这一天然屏障,更是交流互通少、冲突矛盾多。

部族主义思想浓厚的吉尔吉斯人坚定地忠于本部族、维护本部族的利益,同时对其他部族具有浓重的排斥心理。这种狭隘的部族忠诚与认同,在地域的加持下,极易催生地区主义,甚至会造成国家分裂、威胁国家统一。

现阶段,吉国南方与北方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源于狭隘的部族认同观念,也直接作用于吉国政治失序的乱象。

四、俄乌冲突对吉尔吉斯斯坦群体对立的影响

俄乌冲突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剧烈的地缘政治震荡,不仅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权力格局,也对中亚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部族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其南北部族矛盾、民族冲突与权力博弈在俄乌冲突的催化下呈现出新的演变逻辑。

俄乌冲突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剧烈的地缘政治震荡,不仅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权力格局,也对中亚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部族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其南北部族矛盾与权力博弈在俄乌冲突的催化下呈现出新的演变逻辑。

（一）地缘权力真空与部族政治的外部干预

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迫使俄罗斯加速调整中亚战略。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加强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控制，试图将吉尔吉斯斯坦纳入其“后苏联空间”的战略缓冲带。然而，这种外部压力也加剧了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

一是北方部族的亲俄倾向：北方精英（如楚河河谷的游牧部族后裔）长期依赖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在俄乌冲突后更倾向于强化与莫斯科的联盟，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

二是南方部族的离心倾向：南方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混合社区，因历史积怨（如1990年苏联划界导致的土地纠纷）对俄罗斯主导的整合政策更为抵触，部分势力甚至转向寻求土耳其、沙特等国的宗教或经济支持。

这种外部干预的差异化，使得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矛盾从传统的南北经济竞争升级为代理人政治博弈。例如，2024年扎帕罗夫总统推动的《土地法典》改革，因触及南方部族首领的土地控制权，引发暴力抗议，而俄罗斯

的默许态度被视为对北方利益集团的偏袒。

（二）经济制裁的传导效应与部族资源争夺

西方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通过侨汇减少、能源价格波动等渠道冲击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加剧部族间的资源争夺。

能源危机是一个突出表现。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断供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吉尔吉斯斯坦北方部族控制的黄金开采业因能源成本上升缩减产能，而南方部族则借机扩大走私网络，通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境非法贩运俄罗斯石油制品，形成“地下经济割据”。

经济基础的不平衡也放大了部族主义的生存逻辑。例如，2023年巴特肯州的土地纠纷案件中，部族长老以“习惯法”推翻法院判决，本质是经济衰退下传统权威对现代法治的反扑。

俄乌冲突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吉尔吉斯斯坦部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适应：既是被外部力量操纵的脆弱性，也是本土社群抵抗现代性侵蚀的韧性。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超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探索基于土地改革、跨部族权力共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综合治理路径。

参考文献：

[1]王正绪,耿曙,唐世平.比较政治学(2021)[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2]斯蒂芬·罗宾斯,蒂莫西·贾奇.组织行为学(2016)[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2005)[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4]焦一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03):15-22.

[5]廖成梅,王彩霞.“伊斯兰国”对中亚的渗透探析[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6,18(01):19-24.

[6]廖成梅,王彩霞.制约中吉乌铁路修建的原因探析[J].国际研究参考,2016(05):8-12.

[7]许涛.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宗教概况[J].国际资料信息,2002(08):24-29.

[8]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四处.吉尔吉斯斯坦因民族问题引发骚乱对我国做好民族工作的启示[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13(06):41-43.

[9]曲鸿渤.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政策研究[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10]田静.吉尔吉斯斯坦选举制度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大创项目] 本文系新疆大学2024年自治区级大创项目《俄乌冲突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秩序的影响》(项目编号: S202420755181)

作者简介: 张炳卉(2005.4-), 女, 汉族, 河南郑州人, 大学本科在读。